

# 漢匈和親的跨文化解讀

——以“昭君和親”為例

劉 召 明\*

**摘 要：**漢匈和親是中國古代和親通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漢匈和親的重要參與者，王昭君向來被歷史學家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而且在文學發展的歷史上，也被作為重要的文學形象漫衍不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昭君其人其名不僅在匈奴族後裔——土耳其的歷史研究中湮沒無聞，而且所有和親的公主及其隨從被汗名化為間諜。為什麼中土兩國對同一歷史人物的研究有冰火之異，評價有霄壤之別？究其原因，既有土耳其歷史學家對於漢匈和親歷史背景的認知偏差，也有中國歷代文學家對歷史人物王昭君的過度演繹與渲染，更有不同文化之間對於和親現象本身的錯位解讀。

**關鍵字：**和親 王昭君 跨文化解讀

##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Peace-making Marriage between Han and Hun**

Liu Zhaoming

### **Abstract**

As a participant of Chinese ancient Peace-making Marriage between Han and Hun, Wang Zhaojun was always given a very high historical position by historians, also, she has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poetry, dramas and novels in China. In contrast however, nobody knows who Wang Zhaojun is in Turkey, and furthermore, she is known as the progeny of Hun and herself and her retinue were considered as spies.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hat explains this phenomenon. The first is the cognitive

---

\* 劉召明，山東財經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聯繫方式：[sdzhaoming@126.com](mailto:sdzhaoming@126.com) 0086-15069053070

bias from Turkish historians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between Han and Hun. Second, Chinese writers overly exaggerate the story of Wang Zhaojun. The last reason is the misinterpretation on the Peace-making Marria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China and Turkey.

*Keywords* Peace-making Marriage; Wang Zhaojun;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和親，作為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歷史上友好交往的見證，千百年來在中國備受史學家、文學家關注，亦被普通大眾傳為佳話。其中，王昭君作為漢匈和親的典範，兩千年來不斷被歌詠傳頌，被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匈奴後裔——土耳其的歷史研究中，不但沒有王昭君其人其名，而且對漢代和親公主及其隨從汗名化為間諜。這一情形令人震驚、遺憾。為什麼中土兩國對同一歷史人物的研究有冰火之異，評價有霄壤之別？本文擬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通過考訂原委，厘清史實，還原真相，對昭君研究在中國與土耳其的反差進行原因揭示，並從中土友好的角度，對漢匈和親中的認知差異進行跨文化解讀。

## 一、西漢匈奴和親的歷史考察

在中國古代民族關係史上，和親既是一種政治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和親始於西漢，盛於隋唐，終於清代。

“和親之論，發於劉敬。”<sup>1</sup>西漢初期，國政初建，經歷了四年“楚漢之爭”，漢朝國力衰弱，“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sup>2</sup>而北方匈奴正處於國勢上升時期。冒頓單于“東破東胡王，西逐月氏，南並

<sup>1</sup> 班固《漢書》卷 94《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 1962 年。頁 3830。下引《漢書》，皆據此版本。

<sup>2</sup> 班固《漢書》卷 24《食貨志》。頁 1127。

樓煩、白羊河南王”，又侵燕代之地“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的地域，<sup>3</sup>後有漢高祖率軍 32 萬遭遇匈奴 40 萬大軍七天七夜的“平城之圍”。之後，為了對付匈奴的侵擾滋事，安撫邊境，漢高祖採用謀臣劉敬的建議，與匈奴和親，並劃疆立界。雙方約定：“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無暴虐。”“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sup>4</sup>由於漢弱胡強，守邊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匈奴居於塞北荒涼貧瘠“苦寒”之地，“逐水草而居”，糧食缺乏，棉衣不足，非常願意通過和親得到中原的物資錢財，而漢朝也看准了匈奴“貪漢重幣”的心理，“亦欲漸而臣之。”<sup>5</sup>在雙方互利互惠的基礎上，西漢從高祖、呂後、孝惠、文帝、景帝、武帝初年，雙方基本遵從了和親之約，甚至漢朝所給予的物質利益有時遠遠高出其所期待，“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sup>6</sup>漢高祖開始到漢武帝時期，先後有 10 位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儘管如此，匈奴依然不斷侵擾漢朝邊境達 20 餘次。其原因誠如班固所雲：匈奴“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重利也。”<sup>7</sup>漢武帝開始，漢匈對抗激烈，而且漢朝開始佔有優勢。李廣、衛青、霍去病等都是對匈作戰中湧現出來的著名將領。“漢匈和親從劉邦到呂後、文帝、景帝，西漢始終處於主動地位，而匈奴處於被動地位。但是，到漢武帝末期之後，主動變為被動，被動則變為主動。”<sup>8</sup>漢武帝在位五十多年，除了初期一次和親外，多次拒絕匈奴單于提出的和親，並持續與匈奴作戰三十年，以致於匈奴人悲唱：“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sup>9</sup>

<sup>3</sup> 司馬遷《史記》卷 110《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 1959 年版。頁 2890。下引《史記》，皆據此版本。

<sup>4</sup> 班固《漢書》卷 94《匈奴傳》。頁 3762、3764。

<sup>5</sup>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 978。北京：中華書局 1960 年影印本。頁 11486。

<sup>6</sup> 司馬遷《史記》卷 110《匈奴列傳》。頁 2895。

<sup>7</sup> 班固《漢書》卷 94《匈奴傳》。頁 3833。

<sup>8</sup> 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頁 99。下引該書，皆據此版本。

<sup>9</sup> 漢歌謠《匈奴歌》。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1995 年。頁 124。

漢武帝之後，在漢強匈弱的背景下，漢匈之間又有過幾次和親。至西漢末年，匈奴內部經過五單于爭位的內亂，再加上天災、饑荒，匈奴徹底衰落。呼韓邪單于在與其兄郅支單于爭鬥的過程中落敗，後來聽從左伊秩訾王的計謀，向漢朝稱臣，求得漢朝幫助，最終打敗郅支單于。西元前 51 年，呼韓邪單于入朝稱臣，這是漢匈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意味著百餘年的漢匈爭鬥以漢王朝取得勝利告終，其象徵意義遠大於事件本身的價值。如班固所說：“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宴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sup>10</sup>西元前 49 年呼韓邪單于再次朝見。西元前 33 年，呼韓邪單于第三次朝見，並主動提出和親，“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sup>11</sup>得到漢元帝的同意，從此便有了昭君出塞和親的歷史故事。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時，匈奴已經衰落，而漢匈和平已經十八年。《漢書·元帝紀》雲：“竟甯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複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甯，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牆為關氏。”<sup>12</sup>昭君和親之後，漢匈之間的和親一直未斷，而且漢匈之間的和平又持續了四十年左右。

但是，在土耳其高中一年級《歷史》教科書中是這樣寫和親的：“西元前四世紀初期，匈奴人侵入了中國的領土。中國人為了阻止匈奴的侵入，把以前在北邊被匈奴佔領過的城牆修好後連起來，修成舉世聞名的長城。但是中國統治者沒有能力阻礙匈奴人的侵入。他們對這種情況無可奈何，只能找別的辦法。中國把公主嫁給了匈奴的統治者們，與公主

---

<sup>10</sup> 班固《漢書》卷 94《匈奴傳贊》。頁 3832。

<sup>11</sup>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 29，“竟甯元年正月”條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 1956 年版。頁 941。

<sup>12</sup> 班固《漢書》卷 9《元帝紀》，頁 297。

一起派去了許多宗室之女來到匈奴宮中。這些宗室之女使用間諜手段收集了很多關於突厥人的情報。為了讓匈奴人在經濟上依賴中國，他們送給突厥首領禮品。經濟援助取消後，就控制突厥人。中國人還在突厥首領之間使用離間法，把匈奴國家搞亂。”<sup>13</sup>這一論斷代表了土耳其史學界的基本觀點。他們認為，在中原地區與匈奴的實力對比中，中原地區始終處於弱勢地位，所以修建長城，但是仍然“沒有能力阻礙匈奴人的侵入”，於是把公主嫁給匈奴的統治者，以求平安。

這一論斷在漢武帝以前是基本符合史實的，但是在漢武帝之後情形有了很大變化。漢武帝時期，匈奴至少六次主動提出和親，但都沒得到批准。漢武帝之後，漢朝也多次拒絕匈奴提出的和親。而西元前 33 年的昭君和親，是“漢匈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匈奴在遭到漢朝重創後幾代單于對和親的一直渴求及屢次求婚的結果。……從漢武帝死後，匈奴由被動的和親轉為主動要求和親，由以和親要脅漢王朝變成了好言美語請求和親。”<sup>14</sup>而個別土耳其歷史學者把漫長的漢匈和親歷史簡單化，顯然沒有從雙方實力對比的歷史變化中把握不同時期和親的具體原因與動態過程。

總之，漢匈和親是漫長歷史過程中的複雜的政治與文化現象。這一現象在不同朝代、不同時期在漢匈雙方都有不同的表現，而且也與不同時期國力狀況、實力對比、君主個性、戰和狀態等有密切的聯繫，因此，對和親的研究，需要基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事實，對和親這一現象做出符合歷史事實的論斷。

## 二、昭君形象在中國

王昭君是漢匈和親的典型，漢匈友好的歷史見證。她對於漢匈和好、穩邊互市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視為民族友好的使者，偉大的女性，被

---

<sup>13</sup> Yasemin OkurIlhan Genc, ortaogretim Tarih 9 sınıf, MEB, Devlet Kitapları, Ankara,2011,s.76-77.(Türkler Ansiklopedisi, C1 s.704'ten özetlenmiştir)

<sup>14</sup> 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頁 101。

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歷史學家翦伯贊認為，包括昭君出塞在內的漢匈和親，“在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卻是維持民族友好關係的一種最好的辦法。”<sup>15</sup>和親對維護北邊安寧，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對漢匈兩族人民經濟、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起到了積極作用。<sup>16</sup>應當說，除了個別學者認為和親是“屈辱性的緩兵之計”、流失金銀財帛、降低國際地位外，<sup>17</sup>史學界對於和親的認識基本上都是積極的、正面的。當下有學者進一步拔高王昭君的，認為昭君出塞對“維護邊疆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促進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sup>18</sup>甚至有人提出昭君是“和平女神”，與西方自由女神相呼應：“昭君文化開發應在境界上予以提升，將其作為東方人類的和平女神與西方世界的自由女神呼應和對話，讓昭君文化走向世界。開發利用昭君文化，發展文化旅遊，正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偉大精神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sup>19</sup>可以說，王昭君的地位也被無限度拔高。

文學家對昭君出塞和親的詠歎和描寫，也構成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觀。從漢代開始，從正史到野史，從歷史到文學，有關王昭君的作品遍佈歷朝歷代，在各種文體間吟詠傳唱。其體裁遍及詩、詞、散曲、變文、雜劇、傳奇、小說。其數量更是驚人，僅詩歌就有 700 餘首。元雜劇有關漢卿《漢元帝哭昭君》、馬致遠《漢宮秋》，明清傳奇有無名氏《和戎記》、陳與郊《昭君出塞》、周之泉《琵琶語》、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夢》、陳宗鼎《甯胡記》、無名氏《青塚記》《王昭君》等，明清小說則有《王昭君外傳》、《女俠傳》、《雙鳳奇緣》。近代以來，則有小說《中國第一美人昭君全傳》、《昭君和番》。在兩千年的歷史上，文人

---

<sup>15</sup> 翦伯贊語，轉引自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頁 523。

<sup>16</sup> 李桂榮《漢初和親政策作用簡論》，《黑龍江民族叢刊》，1995 年第 2 期，頁 127。

<sup>17</sup> 芮傳明《古代“和親”利弊論》，《史林》，1997 年第 2 期，頁 7。

<sup>18</sup> 劉加洪《從“昭君出塞”探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 年第 2 期（卷 2），頁 24。

<sup>19</sup> 曹詩圖等《昭君文化旅遊開發的現實意義與戰略構想》，《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2 期（卷 26），頁 21。

競相題詠，踵事增華，持續繁衍，傳播不息。直到今天，昭君題材依然生命不衰。現當代關於王昭君的戲劇或小說有郭沫若的兩幕話劇《王昭君》、顧青海的三幕話劇《昭君》、曹禺的五幕話劇《王昭君》，以及高陽的小說《王昭君》、龐天舒的小說《昭君出塞》、金斯頓的小說《落雁韻舞王昭君》等。在商業開發方面，由於在內蒙古、山西北部傳說中的昭君墓多達十餘處，而最大的在呼和浩特市，即青塚，所以呼和浩特市定期舉辦“昭君文化節”，當地多有以昭君命名各種企業與商品，如昭君集團、昭君大酒店、昭君美食村、昭君香煙等等。人們認為“昭君文化”的內涵就是“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睦和不同民族之間生產技術、文化藝術方面的交流以及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秩序的安定，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sup>20</sup>總之，借助於小說、戲曲、話劇、歌舞、音樂、變文等通俗文藝形式及商業開發，昭君故事廣泛流傳，昭君美名流芳百世。王昭君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學上一個偉大的存在，如著名劇作家曹禺所說：“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又是一位偉大的女人。”<sup>21</sup>

### 三、昭君形象在土耳其

那麼作為漢匈和親的另一當事國後裔，土耳其歷史上、文學中是如何看待昭君和親的呢？是否對王昭君有對等或近似的評價呢？

答案非常令人震驚、遺憾。沒有人知道王昭君是何人，更不知道她對歷史上的漢匈友好有何貢獻，而且學生一致認為嫁給匈奴頭領單于的漢朝公主及隨從是漢朝派至匈奴的間諜。土耳其歷史上沒有王昭君其人其名，其偉大之處無從談起也罷，但她同其他和親公主一樣被汗名化為間諜，則是令人震驚的。

關於漢匈和親的具體史實，土耳其高中一年級《歷史》教科書是這樣敘述的：“冒頓單于去世後，他的兒子 Ki-ok 接替了他的位置。Ki-ok

---

<sup>20</sup> 劉佑華《“昭君文化”是這樣“響”起來的一張茂霖弘揚昭君文化大事記》，《民族團結》2000年第10期，頁27。

<sup>21</sup> 曹禺《昭君自有千秋在一我為什麼寫〈王昭君〉》，巴特爾《昭君論文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繼續對漢朝發動襲擊。後來為了同漢朝搞好政治、經濟的關係，他跟漢朝公主結了婚。利用公主和親，很多漢朝的使者和奴婢來到了匈奴。這些人不僅做間諜，而且做分裂的宣傳。後來在匈奴東部發生了許多暴動。這些暴動削弱了匈奴政權。一段時間後，Ki-ok 死了，匈奴國內混亂。利用這樣的機會，中國人把失去的領土又拿了回來，並重新控制了絲綢之路。”<sup>22</sup>這裡提到的與老上單于 Ki-ok 結婚的公主，不是王昭君，而是不知名的公主，而且土耳其歷史課本上根本沒有出現王昭君的名字。另據瞭解，在其他研究土耳其的歷史著作中，也沒有王昭君的名字，更無其事蹟資料。所以，一提到歷史上的漢匈和親，土耳其學生人人皆知，而且都認為和親的公主及其隨從是漢朝派來的間諜，而且他們在匈奴做了不好的事情。雖然土耳其的歷史課本中沒有直接說公主是間諜，但是言外之意，公主絕非可以置身其外。因為如果說公主也是間諜的話，匈奴竟然還不斷接受、請求和親，那無異於自掌其臉。

土耳其歷史教科書中關於和親公主及隨從為“間諜”說法，主要來自個別歷史學者對和親的錯誤解讀和對當時漢匈形勢的錯誤判斷。他們認為，“毫無疑問，與中國朝廷持續聯姻關係是一種政治行為。不過這樣一來，對與中國接觸的所有突厥國家來說，帶來了不好的後果。因為兩國之間的這種接近給了中國使用伎倆的機會。外交官和外交使節利用中國公主在匈奴的特權，很容易進入境內。他們在匈奴帝國內不同的突厥國家之間製造矛盾，試圖推翻匈奴。由於進口的中國絲綢在匈奴貴族間很受歡迎，Kiok 時代沒有發現不利的情況。但是到了他的兒子軍臣單于時，中國被認為是動盪產生的根本原因。”<sup>23</sup>另一歷史學者也持同樣看法：“冒頓以後的單于娶了中國的公主。與中國朝廷建立關係並持續聯姻，代表了一種政治行為。但是和親政策開始以後，給與中國接觸的所有突厥國家帶來了不好的後果。兩國之間的這種接近關係給中國提

---

<sup>22</sup> Ahmet Yilmaz, ortaogretim Tarih 9 sinif, Ekoy Egitim Yayıncılık Matbaacılık San. Ve Tic. Ltd. Sti. Ankara 2015, s.84.

<sup>23</sup> Ibrahim, Kafesoglu, Turk Milli Kulturu, Bogazici Yayinlari, Istanbul, 1988, s.62-63

供了使用陰謀的機會。中國的外交使節利用漢族公主在匈奴的特權，隨便進入匈奴境內。而且他們在匈奴內部進行分裂的宣傳，謀求推翻匈奴。”

24

以上幾則資料，集中於兩個問題：漢朝統治者因懼怕匈奴武力侵犯，採取和親的方法，以美女換和平；這些公主及其隨從同時承擔了收集情報的任務，為破壞、甚至顛覆匈奴政權做準備。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如第一部分所分析，在漢武帝以前，漢朝的確是出於和平的角度，利用和親穩定邊境。但漢武帝統治時期及以後，往往是匈奴主動提出和親。因此，和親的漫長歷史過程應當結合具體的歷史時期作具體分析。關於第二個問題，從《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主要記載和親史實的典籍來看，向來未見和親公主及其隨從搜集情報、從事間諜活動的記載。不知個別歷史學家的判斷從何而來？而且就常理來說，如果和親公主及隨從真的從事間諜活動，威脅國家安全的話，為什麼歷史上從沒有和親公主及隨從被處罰或者處死、或者兩國因此翻臉斷交、甚至發動戰爭的歷史記載？為什麼漢武帝期間及以後匈奴多次主動提出和親？可以想見，如果匈奴單于認為和親公主及隨從真的做間諜，也不會讓她們接觸重要情報，更不用說，在當時條件下傳遞情報有多艱難了。因此，包括昭君在內的和親公主及其隨從在匈奴做間諜的說法很難成立。

#### 四、昭君和親的跨文化解讀

王昭君作為漢匈和親的典範，民族友好的使者，向來被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關於昭君和親，最早出自《漢書·元帝紀》：“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sup>25</sup>《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sup>26</sup>《後漢書·南匈奴傳》則作了更進一步的記載：“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

---

<sup>24</sup> Gulcin Candarlioglu, *Islam Oncesi Turk Tarihi ve Kulturu, Turk Dunyasi Arastirmalari Vakfi, Istanbul 2003, s.20*

<sup>25</sup> 班固《漢書》卷9《元帝紀》。頁297。

<sup>26</sup> 班固《漢書》卷94《匈奴傳》。頁3803。

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禦，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sup>27</sup>可以說，從《漢書》到《後漢書》，昭君故事就開始不斷豐富，融入了野史傳說的成分。關於昭君的身份，《漢書》說是“良家子”，即醫、巫、商賈、百工之外人家的女子。其所謂的公主身份，是和親前臨時冊封的。昭君為什麼和親？目前有君王賜親說、失意自薦說、畫工醜圖說等。一般認為，自從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漢匈之間化干戈為玉帛，長達五六十年沒有戰爭。這在西漢歷史上是罕見的。事實上，之所以有五六十年的和平友好，固然可能離不開王昭君和親的貢獻，但是當時匈奴已經衰落、呼韓邪單于入朝稱臣、漢匈和平已達十八年之久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即便如此，我們仍可以說，王昭君成全了漢匈和親，而和親也成就了王昭君。如唐代王叡《解昭君怨》所雲：“當時若不嫁胡虜，只是宮中一舞人”。清人劉獻廷《王昭君》也說：“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sup>28</sup>

在土耳其，人人知道漢朝公主嫁入匈奴，卻沒人知道王昭君的名字，昭君故事一直湮沒無聞，甚至千百年始終如一被扣著“間諜”的帽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土耳其歷史中對於漢匈和親的負面理解甚至誤解。而在中國，昭君研究、和親研究一直是漢匈歷史研究的熱點，而且王昭君被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由此可見，昭君研究乃至和親研究在中國與土耳其之間存在嚴重的錯位問題。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關於昭君和親，最初史學家只是寥寥數語的簡括勾勒，而文學家對於昭君的興趣、想像卻與世推移、愈演愈烈。文學家在昭君故事的演化

---

<sup>27</sup> 範曄《後漢書》卷 89《南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 1965 年版。頁 2941。

<sup>28</sup> 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1982 年。頁 63、206。下引該書，皆據此版本。

過程中，一方面，突出強調昭君出塞犧牲自我、維護民族團結的大節大義，另一方面，深情描寫昭君作為絕色美女，才情兼善、風流千古卻命運坎坷、抑鬱悲怨的女性文學形象。在文學家的筆下，昭君故事已經脫離了歷史本真，成為一個極具浪漫、傳奇色彩的文學題材，並被不斷渲染、放大，而昭君本人的形象也被不斷拔高、美化甚至神化。可以說，王昭君的歷史地位更像是文學家而非歷史學家賦予的，“有些詩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淚。”<sup>29</sup>或是“借昭君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sup>30</sup>

在昭君傳說中，嬌弱女子的個人命運與軍國大事、民族關係聯繫在一起，事件本身就有重大厚重的歷史意義，題材本身也隱含了巨大的文學價值。類似題材在中國歷史上絕非僅有。如梁辰魚《浣紗記》以西施、範蠡的愛情故事寫吳越春秋；孔尚任《桃花扇》以李香君與侯方域的個人遭際寫南明興亡；洪升《長生殿》借楊貴妃、李隆基的愛情傳奇寫“安史之亂”。但與這些故事女主角不同的是，王昭君和親匈奴，身入異域，肩負了不同民族間交流交往的歷史使命。這一特殊的題材無論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都對文人具有獨特的吸引力。

從空間環境來看，遠嫁異域更能激發文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不僅匈奴的居住地地形風貌、自然氣候等條件不同于中原，而且在語言文化、民風習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原農業文明迥異。和親烏孫的細君公主曾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sup>31</sup>同樣的自然人文環境中，王昭君遠離故土，舉目無親，形單影隻，步履維艱，會為憐香惜玉的文人營造了無限的想像空間。如白居易《王昭君》想像

---

<sup>29</sup> 翦伯贊《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巴特爾《昭君論文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sup>30</sup> 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頁9。

<sup>31</sup> 班固《漢書》卷96《西域傳》。頁3903。

昭君身居匈奴之地：“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殊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sup>32</sup>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則想像昭君流落天涯、思親至死的景象：“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諮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來傳漢家。漢家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33

從空間對比來看，生長于中原地區的中國文人對遊牧民族有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昭君和親匈奴也更容易激起文人對身居荒涼、落後之地的王昭君的同情心。如西晉石崇《王昭君辭》：“延我如穹廬，加我闕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昔為匣中玉，今為冀上英。”<sup>34</sup>因此，文人墨客更容易從感同身受的角度，對身處匈奴的王昭君的悲傷哀怨予以懸揣模擬，從而進一步豐富昭君故事的內容，推進昭君故事的演化。

從時間上來看，千古以來，關於昭君的各种傳說、故事層層迭加，重重渲染，累積而下，蔚為大觀。不同文體之間相互影響滲透，交叉融合，共同為昭君故事推波助瀾。從《漢書》到《後漢書》，從蔡邕的《琴操》到石崇的《王昭君辭》，從北周庾信的《昭君詞》到宋代王安石《明妃曲》，從馬致遠的元雜劇《漢宮秋》到當代曹禺的話劇《王昭君》，昭君故事流傳千古，昭君形象躍然萬代。而且文人喜歡求新求變，作翻案文章。這更令昭君故事繼往開來，搖曳多姿。如關於野史記載的毛延壽“畫工醜圖”，宋人王安石《明妃曲》雲：“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明人邱浚則說：“當時不遇毛延壽，老死深宮誰得知？”清人龔景瀚卻說：“君王莫殺毛延壽，命薄還應命不朽。”<sup>35</sup>可謂見仁見

<sup>32</sup> 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頁 59。

<sup>33</sup> 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頁 75。

<sup>34</sup> 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頁 30。

<sup>35</sup> 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頁 63、71、152、246。

智。同一題材，從不同角度發前人之未發，逆前人之已發，歷來是文人展文心才情、競奇思異想的慣常技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昭君和親題材歷久彌新、綿延不絕。趙翼雲“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動人聽也。”<sup>36</sup>這樣，昭君和親的歷史故事到了好奇尚新的文人手中，就從歷史家的厚重典藏，淪為文學家的筆底風雲。

文人對美人憐香惜玉、一往情深，自古有之。如果沒有文學家的熱情參與，王昭君可能同其他多數和親公主一樣默默無聞。“昭君生活的時代離人們越久遠，其形象似乎越清晰、越豐滿、越動人。”<sup>37</sup>但是文學家對王昭君的憐香惜玉與熱情歌頌，卻有任意誇大、拔高之嫌。誠如有學者指出：“漢匈之間 50 年沒有戰爭，實是匈奴畏威懷德的結果，不能完全歸功於昭君和親。昭君出塞只是起到了增進信任、加強和鞏固漢匈間業已存在的和睦關係之歷史作用。”<sup>38</sup>這一評價客觀、公允，實事求是地指出了昭君在漢匈關係中的歷史作用。相形之下，文人及個別歷史學者則有片面拔高之嫌。對此，魯迅先生一向持批判態度：“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裡，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sup>39</sup>“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sup>40</sup>研究和親史的專家崔明德先生在《中國古代和親通史》中也指出“對和親公主的作用無限拔高的傾向。我們承認，和親公主在發展民族友好關係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將其說成系雙方安危於一身，則未免有拔高之嫌。其實，兩個民族的友好關係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即使和親公主個人再有才能，也難以獨自促成雙方

---

<sup>36</sup> 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131。

<sup>37</sup> 周競紅《昭君想像與時代變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1 期（卷 35），頁 56。

<sup>38</sup> 張文德《昭君故事傳承與嬗變》，南京師範大學 2004 屆博士論文，頁 18。

<sup>39</sup> 魯迅《且介亭雜文·阿金》，《魯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頁 201。

<sup>40</sup> 魯迅《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頁 216。

的友好關係。”<sup>41</sup>

那麼為什麼和親公主及其隨從會被汙名化為間諜？從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和親史上來看，在同個別少數民族和親時，的確有利用個別和親公主實現政治、外交的意圖。如劉敬在建議漢高祖和親時說：“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sup>42</sup>最後一句話點出了和親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匈奴最終臣服漢朝。應當說，這段話表明了和親作為政治策略的最終指向，也展示了劉敬的政治遠見。其他如元封六年（西元前 105 年），西漢派細君公主與烏孫和親，就是出於對付匈奴的目的，採納了張騫的建議。“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sup>43</sup>可以看出，細君公主是帶著政治任務出嫁到烏孫的，但遺憾的是，細君公主由於語言、環境等方面難以適應，而且烏孫昆莫獵驕靡年老體弱，兩人沒感情可言。後被獵驕靡嫁給孫子岑誡。細君公主上書徵求漢武帝意見，結果被告知“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sup>44</sup>只好被迫嫁給岑誡。細君公主在烏孫生活四五年即染病而亡，並沒有完成烏孫與漢聯盟，共同對付匈奴的任務。<sup>45</sup>這一任務就落在後來的解憂公主身上了。從歷史上看，解憂公主對於加強漢與烏孫的友好，共同抗擊匈奴發揮了重要作用，出現了“漢之號令班西域”的局面。上述兩例，只能說明和親作為政治手段、外交工具的重要作用，其並不代表這些和親公主及其隨從作了危害匈奴或烏孫國家安全的間諜行為。

<sup>41</sup> 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通史》。頁 534。

<sup>42</sup> 司馬遷《史記》卷 99《劉敬列傳》。頁 2719。

<sup>43</sup> 班固《漢書》卷 61《張騫傳》。頁 2692。

<sup>44</sup> 班固《漢書》卷 96《西域傳》。頁 3903。

<sup>45</sup> 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66 下。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頁 1627。

前述個別土耳其歷史學者也認為和親是一種政治上的聯繫或者聯姻，那麼為什麼會認為漢朝有派遣間諜的意圖呢？筆者以為這與雙方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有深刻聯繫。漢匈和親的歷史過程中，雙方主動與被動的交互換位完全以武力決定。匈奴擅長騎馬射箭，崇尚武力，貴壯賤弱，勇猛好戰，崇尚英雄氣概與武力征服。而且漢匈兩族長期以來，戰爭不斷，彼此之間只有武力的較量，缺乏相互的信任。因此，部分土歷史學者認為，和親的問題上，匈奴始終強大，處於強勢，漢王朝一直軟弱，處於劣勢，所以主動和親。否則，無法解釋匈奴衰弱後雙方仍然和親的歷史事實。事實上，如前所言，呼韓邪單于入朝稱臣後，漢匈強弱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漢朝之所以在匈奴衰弱後、仍然同意和親體現的是漢王朝以仁政為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儒家政治文化：“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sup>46</sup>因此，在對和親的解讀上，部分土耳其史學家認為漢朝在實力上始終弱於匈奴，所以以和親討好匈奴，並利用和親公主及隨從做收集情報、顛覆政權的間諜工作；而中國史學家認為，匈奴即便衰落，漢族仍然與匈奴和親，體現的是統治者仁政的王道政治，是一種民族友好的善舉，傳遞的是與鄰為善的信號。但遺憾的是，由於雙方文化的差異，雙方史學家對和親的評價認知不同，再加上文學家的介入，致使雙方對和親的評價表現出嚴重的錯位現象。

和親，說到底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聯姻，充其量是外交的工具，只是為了拉近雙方感情距離，走親情路線，盡可能避免戰爭，以求得邊境安寧與國家太平。漢匈和親的公主及其隨從不會做搜集情報、分化國家的危險舉動，漢王朝也不會把國家安危、軍國大事系于和親公主之身，更不會讓她們冒著個人生命危險和國家信譽風險從事間諜工作。從這一意義上說，和親，也僅僅是和親。

---

<sup>46</sup> 班固《漢書》卷94《匈奴傳贊》。頁3832。

## 致 謝

本文系作者在土耳其工作期間撰寫完成。土耳其埃爾吉耶斯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哈桑（Hasan Huner）、盧美莎（Rumeysa Sen）為本文引用的土耳其中學歷史課本與部分學者的觀點，提供了翻譯服務。在此謹致謝忱。

## 參考文獻

- 王先謙（1983）。《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
- 王欽若等（1960）。《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
- 王樹民（1984）。《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 司馬光（1956）。《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
- 司馬遷（1959）。《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 李桂榮（1995）。《漢初和親政策作用簡論》。《黑龍江民族叢刊》，1995年第2期，頁125~127。
- 芮傳明（1997）。《古代“和親”利弊論》。《史林》，1997年第2期，頁5~17。
- 班固（196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 周競紅（2008）。《昭君想像與時代變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卷35），頁55~58。
- 張文德《昭君故事傳承與嬗變》。南京師範大學2004屆博士論文。
- 崔明德（2007）。《中國古代和親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曹禹（2003）。《昭君自有千秋在一我為什麼寫〈王昭君〉》，巴特爾《昭君論文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曹詩圖等（2004）。《昭君文化旅遊開發的現實意義與戰略構想》。《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卷26），頁20~24。
- 遼欽立（1995）。《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 魯迅（1981）。《且介亭雜文·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1981）。《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歌等（1982）。《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 劉加洪（2002）。《從“昭君出塞”探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卷2），頁24~26。
- 劉佑華（2000）。《“昭君文化”是這樣“響”起來的一張茂霖弘揚昭君文化大事記》。《民族團結》，2000年第10期，頁26~27。
- 範曄（196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Ahmet Yilmaz(2015). *Ortaogretim Tarih 9 sinif*,Ekoy Egitim Yayıncılık Matbaacılık San. Ve Tic.Ltd.Sti.Ankara.

Gulcin Candarlioglu(2003). *Islam Oncesi Turk Tarihi ve Kulturu*, Turk Dunyasi Arastirmalari Vakfi, Istanbul.

Ibrahim,Kafesoglu(1988). *Turk Milli Kulturu*, Bogazici Yayinlari, Istanbul.

Yasemin OkurIlhan Genc(2011). *Ortaogretim Tarih 9 sinif*, MEB, Devlet Kitaplari, Ankara.